

附錄
一

蔣復璁作品精選





孔子忠恕一貫之道釋義

《論語·里仁篇》說：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清陳澧《論語話解》說：

曾子平日用功最切實，事事都要求出道理，不肯絲毫放過。功夫用得久了，見得道理無窮無盡，必有總彙所在，只是信不及。有一日，孔子指點他說道：「參，從我學道也久了，事理上講究也多了。但我這箇道，用處有千萬樣，不是零碎湊成的。」曾子聽孔子這番教訓，正打在心坎上，疑團盡破。連忙答應道：「唯。」孔子見他心裡已明白，不必再說，隨即出門去了。那些門人在旁聽了不懂。因為曾子道：「夫子方纔說的一貫，是怎麼講呢？」曾子說道：「我們從前把夫子底道看得太高了，所以不懂得。其實只是切己底事，人心上都有天理，依著天理盡自己實心作去，這叫作忠。又將自己底心推到別人的心，把人已看成一體，這叫作恕。有這忠恕兩字，天下事再沒有行不去底。把忠恕作到透熟，那一貫就在裡面了。我們要學夫子底道，只守信忠恕兩字，便是不錯。若丟開忠恕，另外去求一貫，那就越離遠了。」這是以前翻譯的語體文，我用來說明，似頗切至。

宋朱子《論語集註》說：

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

取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也，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之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然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

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以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實可見矣。故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於義亦通。

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為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知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朱子於《集註》頗發已極深切，而與《語類》尤為明晰，可以參看。

《朱子語類》說：

- 一以貫之，猶言以一心應萬事。忠恕是一貫底注腳。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 一是一心，貫是萬事，看有甚事來，聖人只是這箇心。
- 一是忠，貫是恕。

忠在一上，恕者貫乎萬物之間。只是一箇一，分者便各有一箇一。老者安之是個箇一，少者

懷之亦是這個一，朋友信之亦是這個一。莫非忠也。恕則自忠而出，所以貫之者也。忠只是一個筒真實自家心下道理，真是見得事事物物接於吾前，便只把這個真實應付將去。自家若有一毫虛偽，事物之來要去措置他，便都不實，便都不合道理。

凡人責人處急，責己處緩。愛己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因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此只是恕，何故子思將作忠恕說？曰：忠恕兩個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故曰無忠，做恕不出來。

《論語》這一章非常重要，所以自來理學家多有說明，於是牽涉甚廣，意旨更加明顯，使我們瞭解到孔子的基本思想在此章內，也就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也在此章內。約而言之，計有兩點：

一、天人思想

《論語·公冶長》說：「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朱子《集註》：「言夫子之文章，日見於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孔子於性與天道，不過少說，並非不說。有時並不明言，而性與天道，含意在內。所以顧炎武《日知錄》說：「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聞。」程子曰：「教人以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朱子語錄》說：「問：曾子未聞一貫以前，已知得忠恕未？曰：他只是見聖人千頭萬緒都好，不知都是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得都是從這一個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好，都是這根上生氣流注去慣也。問：枝葉便是恕否？曰：枝葉不是恕，生氣流注貫枝葉

底是恕。信是枝葉受生氣底，恕是夾界半路來往底。信是定底，就那地頭說，發出忠底心，便是信底言。」此條以忠信忠恕比言之，無忠便無信，猶如無忠即無恕。忠信恕三字，只此一心，當先有忠，乃可有信與恕。天賦之性為心之體，忠由心出，忠為天道，信與恕再由忠出，信為實之忠，恕為有忠之恕，也都是天道。忠是天性與天的代名詞，孔子不明言，所以顧炎武說：「性與天道在其中矣。」朱子論理氣，心性，道器都與天人相同。道、理、心、性都是天，忠也是天。程子說：「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吾道一以貫之」，朱子釋一為心，實則一心者天心也。道為天道，理為天理，實際上都是天道。自來理學家講的天理，認為是義理的天，簡單言之，都是主宰之天。《論語·魏靈公》說：「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朱子《集註》說：「弘，廓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道者，一本萬殊也。人各有天賦之道，萬殊一本也。道體無為，人能大天賦知道，即《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也。所以程子引《詩·周頌》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又引《易·乾卦》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命無窮是天道，「乾道變化」是人道。在《中庸》則「天命之謂性」是天道，「率性之謂道」是人道。天必藉人而起作用，所以說：「人能弘道。」朱子論天下與論理氣相同，並非天人對立，乃一體兩分。《朱子語錄》說：「天即人，人即天。仁之始生，得於天也。既生此人，則天又在人矣。凡語言動作視聽，皆天也。只今說話，天便在這裡。」天藉人而弘其道，人亦與天合而有為。《易·乾卦》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無非說，大人也就是聖人，能去私欲，乃於天合一而行事。《中庸》說：「誠者，

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真實無妄之為誠，忠者無妄，所以誠與忠都是天道，都能無私。《朱子語錄·子貢問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說：「問：孔子言恕必兼忠，如何？此只言恕？曰：不得忠時不成恕，這恕時忠在裡面了。」孔子言恕必言忠，就是天人合一方成用，《論語》說：「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天人合一方能有所為，如何合一，誠實無妄可以合一，所以《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人道學天之誠，此即人去私而合天。因此吾道一以貫之章天思想非常明晰，教人為學之方也。這是孔子的基本思想，也是儒家的基本思想。

一一、仁愛思想

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天的信念。天是真實無妄，至善而公平無私。天道是體，仁道是用。仁是天之用，所以政治、宗教、禮制，一切法則，都以人為原則。是孔子在《論語》中回答門弟子問仁因人而異，因地而殊，即同一人而前後所答不同，為的範圍廣博，任何方面及任何問題，皆可與仁有關。孔子說：「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天也，一者仁也。分而言之，忠恕以貫之，忠恕皆天也。孔子說：「仁者愛人」及「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是仁的能。後世仁愛並稱，所以吾們稱為仁愛思想。孔子對全德之完人又聖人，完全的道德為仁，最佳的德行為孝。《釋名》說：「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悅好也。」孝作愛解。《論衡·問孔》說：「忠猶愛也。」《說文》說：「忠，仁也。」忠，恕，孝皆可以作仁愛講。萬物一體，無所不愛，仁道可推之極點，所以仁愛思想是孔子及儒家的基本思想。

三、結論

儒家的道是宇宙的法則，道家的道為宇宙的本體。北宋周濂溪以宇宙根源為太極，如儒家天人體用之倫。再採《易·繫辭》太極生兩儀而有陰陽兩氣，再仿《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於是由陰陽兩氣而分水木金火土，然後由男女兩性而生萬物，人為萬物之靈，人極立焉。用《乾卦》天地合德之說，說明天人合一之道。這是周濂溪的《太極圖說》。此圖襲自道家，自上而下，雜糅道儒，混《老子》、《易經》及五行說為一，由本體方面一轉而達於心情和倫理。此圖可稱縱的天人合一學說，合本體論與倫理說為一，從此中國哲學牽涉到：倫理、宇宙論與人生論混合不分。孔子的仁道，在北宋時有張載，他的倫理觀，也是由本體觀演繹出來，「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與我一體，合其德於天地，則自然合其理。這是他人生觀的大綱。周濂溪用無數太極的理，綜合儒道的思想，組織一大宇宙觀，就是《太極圖說》。張載的《西銘》，也是用其本體觀，仁道，綜合古來儒家的倫理觀組織一大系統，就是《西銘》。我稱之為橫的天人合一說。張載澈去吾人生觀的差別觀，當和宇宙本體，至誠知道結合，能此者即是聖人，其能與《中庸》相同。萬物一體，人或物都可與至誠之道，「誠者，天之道也」，也就是與天結合，我稱為橫的天人合一說。仁道的擴展宋儒於此非常重視。程明道識仁說：「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知信皆仁也。」《朱子語錄》說：「天地萬物與我一體，固所以無不愛。」張載的《西銘》是說明萬物一體，天地，若父母，萬言萬物，實觀仁道。因此我用周濂溪的《太極圖說》來說明孔子天人思想受道家影響而成大宇宙觀的《太極圖說》，用張載的《西銘》來說明孔子的仁愛思想，益他的太虛一元氣的本體

論。連同儒家的倫理觀，擴大仁道。目的都要實現天人合一。然而離「吾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矣」遠矣。最後此章簡而言之，仁是愛，積極的愛是忠，就是「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消極的愛是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遵此而行，就是孔子所謂「吾道一以貫之」，也是孟子所謂盡興知天。



訴信

我蒙天主聖寵領洗已有五年了。在這五年中有許多朋友，向我探詢：「為什麼信天主教？」我為答覆這些朋友，故以我這一知半解，仰託天主的庇佑，寫了幾篇文章，譯了幾段經文，來訴說我的信仰，簡括一句話，我是因為明白了這一點道理，所以信仰公教的。現在我要具體說明的，尚有兩點：

一、生活中的體會

我生於浙江海寧縣的硤石鎮。離硤石約有五里之遙的一個村，名為車輻浜，是明末清初以來，天主教神父從澳門經由海道而來傳教的一個地方——海寧是浙江錢塘江口濱海的一縣。我在五歲時，隨同先母去過一次，至今尚依稀記得。在這個村裡，天主教會建築有宏偉的教堂、修院、醫院、育嬰堂、養老院等，江南除徐家滙外，恐以此為最早的傳教區。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聖教會，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覺得幽靜明潔，與我們所居的鄉鎮，大不相同。我於一九三〇年赴德留學，在歐洲看了許多有名的教堂，增加了歷史的認識及藝術的欣賞。從藝術方面看，則教堂是集繪畫及雕刻大成，完美地表現在教堂的建築，教堂是西洋藝術的代表作品。西洋藝術作品的題材也往往採用希臘的神話及聖經的故事，使我們知道西洋文化是建基於希臘文化與天主教會之上的。從歷史方面看，則中世紀是天主教的世紀，她保存了希臘與羅馬的文化，融會貫通了希臘與羅馬的文化；她又孕育了近世紀文化，承上啟下，產生了近世紀的西洋文化，所以要了解西洋文化，非了解西洋文化的背景——

天主教不可，我在歐洲觀察的結果，引起了我對天主教會的注意。回國後，我因建築中央圖書館館廈，向天主教商洽一塊屬於教會的基地，因而認識了于斌總主教，更因而認識了天主教會的組織與制度。我是一個中國人，當然葆愛我們國史上大一統的觀念及儒家修齊治平之道。但曠觀全世界，真能作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及歷史的悠久，組織的完整統一，除了羅馬公教會，再無其他組織，因為它是自吾主耶穌創立以來，兩千年來，歷久彌新的。因為天主教歷史之久，所以保存了舊的傳統，舊的制度，其儀式的文節之美，與中國的禮樂，彷彿相同，聲容之盛，與宮室之富，相互配合，真是黼黻文章，滿足了我精神上的快感。我們知道，公教的儀式，雖有藝術的成分，但並不是藝術，它雖能聖善地滿足人的感覺性，然而它並不是玩藝及戲劇。公教的儀式是信徒對於自己的主宰應當表示的一種欽崇的敬禮，發抒其向天主的愛慕，朝拜感謝、祈求，以及其他基本善情。而基督也藉著彌撒，與我們一起祈禱，一起祭獻，這是天人合一的有形之方法。儀式是崇敬的方法，所重在誠。誠者，實也，信也。誠要真誠，信要誠信。〈聖雅各伯書〉說：「然務必求之以信，莫存絲毫狐疑。狐疑之人，如海上波濤，因風而起，隨風而轉，漫無定止；若是之人，莫望有所受於主也。」《論語·八佾》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完全一樣。求不以信，求何能得。「人而不仁，」就是忘禮樂之道，不誠無物，禮樂徒為其膚廓之儀式，這種禮樂就不成其為禮樂。如果真要誠了，則《漢書·郊祀志》說：「民之精爽不貳，齋肅聰明者，神或降之。」所以《論語·八佾》又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時，必須必誠必敬，就像神明在上一般，這才是誠信表現。



《中庸》說：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中庸》此章，對於神的存在，說得最為透澈，視之弗見，聽之弗聞。體照漢注，作生解，生百物而無所遺。使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這種感覺，如在舉行彌撒時，就可以感覺到。天主無所不在，豈可厭倦，天主全知全能，無微不顯，豈能隱瞞遮掩，其靈如此，豈能令人不信。

《中庸》說：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

真實無妄之謂誠，天道是真實無妄的。人道是求真實無妄之誠。人而能誠，天人即可合一。

〈聖若望一書〉說：

天主便是光明，無絲毫暗昧存乎其中。……吾人能實踐光明之道，有如天主之光明者，則吾人實已彼此神交心契。

《中庸》說：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我從生活中體會到有「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的天主！我一生的遭遇，都在天主聖寵

養育之中，我的榮譽歡樂，固是天主的賞賜，就是我所感受的痛苦，未嘗不是天主的懲戒，要成全我這腐朽不才之人。我又體會到聖葆樂所致〈格林多人後書〉說：「爾曹詎不自知基督實於爾心中乎？」天主居我心中。因此我深深體會到朱子所不能明悉以言的「慎獨」在天主教教義中得到了了解，豁然明朗，使我思言行動，不敢不敬，不敢不慎。然而三仇為害，自訟改過，每有不逮，實有賴於天主教的告解，然後心安理得。因為我有天主及天主居我心中的體會，所以不敢不信，並且相信天主在一切之內，中國的文化，西洋的文化，真理惟一，沒有不同源的。

二、思想上的了解

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世界公認是獨立自發的文化，且自漢武帝表彰儒術以來，百家皆所屏斥，兩千年來，可以說是儒家獨尊的天下。但是仔細研究，實又不然。

《漢書·元帝紀》說：

《論語·泰伯》說：

宣帝即位，八歲，立為太子，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為罪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迺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漢武帝表彰儒術，宣帝即說：「漢家自有制度，」足見漢代並不全用儒術，在實際上，漢代是黃老盛行，道家的影響，遠勝儒家，習儒術的如博士等，僅傳經籍的訓誥，其餘學者大多為獵官博

祿之用，並不能傳述儒家的精神。漢代建議崇儒的是董仲舒，他的學說，以天為基礎，天為萬物之本，人與物皆有天而生，天是有人格，（我們說天是有人格的，人格一字乃英文之 Person，凡能明理者，皆有此 Person，其意義為完整、獨立、自主之有靈體，並非專指人，因神有人格而無人格，稱人格者乃從俗也）有意志的天帝，這是他的了不得處，但是他受鄒衍的影響，牽於陰陽五行，天帝為五，走入迷信之途。漢代還有一個思想家是王充，他私淑黃老，所以說：「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王充開魏晉的思想。魏晉士大夫競尚清談，以道家老莊的眼光，讀儒家的經籍，下迄楊隋，天下從風，所以著重性情，看輕才業，遭受外禍，無法抵抗，不是偶然的。由老莊之自然，轉而為佛教之寂滅，唐代的思想界，重心乃在佛教。傳儒術的，唐初有孔穎達等《五經正義》之撰，殊不破注，悉遵漢注家法，在思想方面沒有多大影響。中唐以後，經學家如啖助及趙匡，在漢人注重訓詁名物以解經，宋人專講義理以解經的中間，做了一點承先啟後的功夫，即一面推翻從前沿襲的講法，一面開發後來獨斷的見解。自漢迄唐是儒道的調和時期，自唐迄宋是儒佛的調和時期。開宋學的路子是李翱的《復性書》，是性二元論，是朱熹理氣二元的淵源，而骨子裡是佛學的思想，宋學即由此開山。宋五子的理學，後人說他們是陽儒陰釋，也因為他們都受了佛教的影響。宋五子的第一人周濂溪，他的《太極圖說》，是宋代了不得的宇宙論，朱熹特為注釋，推謂得千聖不傳之祕，孔子後一人而已。陸象山疑為老氏之言，考其實則確從陳搏種放而來，是道教的東西，所以宋學的成分，一面是釋，一面是老，儒家不過是其表面，是成分之一。陸象山的發明本心及明代王陽明的致良知都說是得儒家的嫡傳，求其實則都有

佛教「明心見性」的嫌疑。因此我以為吾國百世不祧的儒家，從思想方面簡略言之，根本並不純粹，中國人是穿儒家的衣冠，作道釋的思想，用法家的方法。秦始皇用李斯行統一思想的政策，李斯是荀卿之徒，由儒而法，在表面上也還是以儒家為正統思想。顧炎武《日知錄》說：「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自來言事功的，如諸葛亮、王安石、張居正等皆標榜儒家，然其任法，未嘗不用申商，儒家用世，大多參用法家，這就是漢宣帝的漢家制度，以「霸王道雜之」的辦法。從中國思想史看，中國兩千年來的思想，與漢代的表彰儒術，大體相同，兩漢魏晉需要道，南北朝及隋唐需佛，宋代正面崇儒，反面用佛老。儒家是中國的正統思想，這是不差的，但中國人又另有其道，即如上面所述，歷代皆以儒為表，另有為之裡者。再考之《周禮》，則師儒並稱，儒外有師。

《周禮》說：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鄭玄注：「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

阮元《國史儒林傳·序》說：

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繫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游夏之徒，以藝兼道。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荀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棄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

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偽，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學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閤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啟後，在於金華，泊乎河東姚江，門戶分歧，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諛也。

阮元對於師儒的演變分合，敘述甚詳，總之師以傳道，儒以授業；故俞樾說：「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技術者也。」阮元雖認師儒分途，然孔子兼備師儒，顏曾游夏，始有所偏重而分歧，這是純從儒家的看法，《隋書·經籍志》的議論就不然了，隋志道家類說：

道者，蓋為萬物之奧，聖人之至蹟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夫陰陽者，天地之謂也，天地變化，萬物蠢生，則有經營之迹。至於道者，精微淳粹，而莫知其體，處陰與陰為一，在陽與陽不二。仁者資道以成仁，道非仁之謂也。智者資道以為智，道非智之謂也，百姓資道而日用，而不知其用也。

聖人體道成性，清虛自守，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故能不勞，聰明而人自化；不假修營而功自成。其玄德深遠，言象不測，先王懼人之惑，置於方外，六經之義，是所罕言。周官九兩，其三曰師，蓋近之矣。

隋唐猶為老氏之學昌盛之世，故以《周禮》九兩之師比道，儒以表儒，六經為儒家之說，師說不著，為以德教，這是儒道並尊而又分殊之說，道家是否是《周禮》的師氏，當然是問題，然儒家以六藝教民，六藝是技術，所以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我們用現代語來解說，儒是以知識教民，這與歐美學校的教育，重在知識的教育相同。人民道德的教育是教會所負的責任。歐美學校的教師實是儒，教會的神父實是師。師儒之分，古今中外，皆所相同。阮元以為宋史道學儒林分傳，即為師儒之分；《隋書·經籍志》則以道儒之別，即為師儒之別；故吾人今日如以儒家學說為儒說，而以公教教義為師說，亦未嘗不可。孔子固然萬世師表，儒者所宗，但刪訂六經，實以言教，這是以六藝教民，耶穌是聖子，是聖言，是天主，自傳道以至釘十字架為民贖罪，以其行教，這是以德教民。孔子說：「巍巍乎唯天為大。」又說：「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信天之篤，可以概見。然而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因為孔子知天而不說，故孔子是體兼師儒，而門弟子則因不聞天道而專稱為儒了。《論語·公冶長》說：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易傳》說：「形而上者謂之道，行而下者謂之器。」器是形器，這是局部的知識，孔子稱子貢是器，就是一種技術專材，這可為子貢不聞天道之證，天道是由下學而上達，器則尚在形而下，沒有

上達到形而上。孔子是做下學上達的功夫，他自己上達天道，這是無問題的，所以《論語·衛靈公》說：「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是消極之愛，是仁之一端。《天主經》說：「願天恕我過，如我恕他人。」耶穌又說：「如爾不恕人，天亦不恕爾」恕是入德之門的要點，子貢問孔子，孔子告訴他的。《論語·公冶長》又說：「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子貢以孔子之言而申言之，然孔子老實不客氣的告訴他，你辦不到。這就可知孔子的學說與基督教義並無不同，並且孔子的基本點是天道觀念，然而以六藝教民，不輕易給人講天道，所以我信仰公教，這是我從儒家的觀點，進一步求夫子所不言的天道而已。我信公教，我要於儒之外求師，這也是根據《周禮》，而為吾們傳統的學術思想路子。中國言性，不知已有千百萬言，性善性惡！孰能定其是非，然如以原罪之說來講，即一言而決。人受性體於天主而生，本性原是善的，然因原罪關係，本性軟弱而易犯罪，並不是本性是惡，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嗎？這也就是天主教教義可以補充及解決中國哲學問題的明證。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告訴中華教友說：「一面修行基督的教義，一面敦篤固有的人倫。」吾中華教友應當在固有文化之外，實行基督的教義，用基督教義引導吾們，求天主給我們超性的信德，這就是上達天道的方法，故吾的信公教，可說是在我思想一個徹底的了解，也是一個中國人的徹底了解。

在我生活的體會及思想的了解之結果，我於四十一年十月三日，由龔世榮神父付洗，當時撰有一詩，以誌我感，特錄於後，作此文的結束。

回生上藥沐春和，了悟人天瘥宿痼。目極浮雲移疊嶂，心澄碧水止層波。
神宮葆衛三仇害，御路追承十字磨。枝接葡萄豈易事，歸榮稱頌感恩多。



石虎舊夢記

人生若夢，往事如煙，回首思量，都是隱約的夢境。我從民國六年至十九年在北平，前後住了十四年，公寓、宿舍、租屋，遷徙不定，最後在西城石虎胡同七號松坡圖書館住了八年，時間最長，在我一生中最舒適的一個時期，對我也可說是一個有意義的時期，因為是我圖書館生活的初期，所以石虎胡同七號這房子，到今天還是縈繞我腦，依稀記得，這是一個美麗的舊夢。

北平有兩個石虎胡同，一在北城，一在西城，這是西單牌樓北的石虎胡同。胡同西口有一個不大的石虎，恐怕是從前府第門口的石狻猊，亡佚其一而遺存至今。胡同裡有一有名的「孩兒王」，那是北平小兒科專門名醫王家，有一半西式的兩層樓房，還有一個蒙藏學校，前有照壁，大門三間，款式好像是一所小型的王公府第，在前清時叫作小府，隔壁是我住的七號松坡圖書館。這房子是北平有名的四大凶宅之一，清乾隆間是裘文達的賜第，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曾有記載。據載說：

裘文達公賜第，在宣武門內石虎胡同。文達以前，為右翼宗學；宗學以前，為吳額駙府；吳額駙府以前，為前明大學士周延儒第。越年既久，又窳闕深，故不免時有變怪，然不為害也。廳事西，小屋兩楹，曰好春軒，為文達燕見賓客地。北壁一門，又橫通小屋兩楹，童僕夜宿其中，睡後多為魅舛出，不知是鬼是狐，故無敢下榻其中。琴師錢生，獨不畏，亦竟無他異。錢面有癩風，狀極老醜，蔣春農繫曰：「是尊容更勝於鬼，鬼佈而逃耳。」一日，鍵戶外出，歸而几上得一兩纓帽，製作絕佳，新如未試，互相傳觀，莫不駭笑，由此知是狐非鬼，然無敢取者。錢生曰：「老病龍鍾，多逢厭賤，自司空以外（文達公時為公部尚書），憐念者曾不數人，我冠誠敝，此狐哀我貧也。」

欣然取者，狐亦不復取去，其果贈錢生耶？贈錢生者又何意耶？斯真不可解矣。

按紀氏所言此屋格式，與松坡圖書館並無稍爽，廳事西之好春軒，後來隔作一小兩大，大為書室，小為臥室，臥室本來有一門可以通至後院西廡的後房兩間，即閱微草堂筆記所言，琴師錢生所居的小屋兩楹。但是紀氏說裘文達之前為右翼宗學，又前為吳額駙府。所謂吳額駙，恐即吳三桂之子應熊，尚清太宗第十四女恪純長公主。吳應熊於康熙十四年因吳三桂反叛，並其子世霖一齊誅死。這個房子因為從明代遺傳下來，樣式雖稍古拙，但其高大寬敞，與後來的房室不同，總之不過是一個大宅子，在樣式上還不像是王公的府第，所以我想在松坡圖書館隔壁的蒙藏學校，從前恐怕是連在一起的。我在北平見過許多府第，總是一排三直落，中間是正房，東西兩邊是花園偏院。所以照我猜想，蒙藏學校是正房，款式與北京大學（原是高清宗第十女和孝公主，下嫁和坤子豐紳殷德的府第）相仿，因此我想吳應熊額駙的府第應當是蒙藏學校，松坡圖書館是偏院，做右翼宗學時還是一起，裘文達做賜第的時候，那已經分成兩宅了。此房所以成為凶宅，據說，凡是住這個房子的，到了最後總要出點事而遷出，清末最後住的是一位河督潘某，因其小姐吊死而搬出，有過一長期的關閉。此宅原是前清戶部的財產，入民國後歸了財政部，新會梁任公先生主持的國際聯盟同志會及林宗孟先生主持的國民外交協會合用了這所房子。民國五年蔡松坡將軍逝世後，新會等在上海組織有松社。民國九年新會自歐返國，想在北平從事文化運動，所以就將松社售去，十一年將圖書運至北平，將這所房子於民國十二年改作為松坡圖書館的第二館，專藏外文書籍。第一館則在北海快雪堂，專藏中籍。

梁任公說先生撰〈松坡圖書館記〉說：

「民國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薨，國人謀所以永其念者則有松坡圖書館之議，願以時事多故，集資不易，久而未成，僅在上海置松社，以時搜購圖籍作先備。十二年春所儲中外書既逾十萬卷，大總統黃陂黎公命撥北海快雪堂為館址，於是以後廡奉祀蔡公及護國之役死事諸君子，擴前楹藏書，且供閱覽。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後猶當想見蔡公為人也。」

民國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梁啟超記。

這篇記是懸諸第一館快雪堂前楹閱覽室內，第一館的舊籍是由何澄一先生編目，新籍是我編的。石虎胡同的第二館的藏書都是英法德日外籍，全部是我編的。我本不懂編目分類的，當民國九年新會自歐洲歸國，在英德法各國購有人文科學及社會科學圖書一萬餘冊，本想在北平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的西廡辦一圖書俱樂部，供留學歐美同學及大學優秀青年閱覽，同時又辦一共學社，從事編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即所謂共學社叢書。主持這件事的是先叔百里先生。他約我去幫忙北大同學陳國築君寫目片，民國十一年陳君去了廣東，於是先叔就要我接替，我在十二年的春天搬進了松坡圖書館，此時我正在北大哲學系三年級肄業。我是一個工讀的學生，擔任編目，月支三十元，在當時算是很好的了。我住在垂花門客廳的西廂房，旁有一月亮門，裡邊就是裘文達的好春軒，張君勤先生及徐志摩與李光忠兩兄都是住過的。東邊月亮門進去是客廳的過道，再進去就是第二進的大院子，上房五間做了閱覽室，東廡三間堆東西雜物，西廡三間是蹇季長先生住的。東廡前面有座藤架，滿願花香，在夏天是我們乘涼的好地方，志摩有石虎胡同七號一詩，就是即景而寫這個園庭

的。他的詩說：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盪漾著無限溫柔。

善笑的藤孃，袒酥懷任團團的柿掌綢繆，

百尺的槐翁，在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摟，

黃狗在籬邊，守候熟睡的珀兒，他的小友，

小雀兒新製求婚的艷曲，在媚唱無休！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盪漾著無限溫柔。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描著依稀的夢景；

雨過的蒼茫與滿庭蔭綠，織成無聲幽暝，

小蛙獨坐在殘蘭的胸前，聽隔院蚓鳴，

一片化不盡的雨雲，倦展在老槐樹頂，

掠簷前作圓形的舞旋，是蝙蝠，還是蜻蜓？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淡淡描著依稀的夢景。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啣著一聲奈何；

奈何在暴雨時，雨槌下搗爛鮮紅無數，

奈何在新秋時，未凋的青葉惆悵地辭樹，

奈何在深夜裡，月兒乘雲艇歸去，西牆已度，

遠巷薤露的樂音，一陣陣被冷風吹過！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輕啣著一聲奈何。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雨後的黃昏，滿院祇美蔭，清香與涼風，

大量的寒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

一斤，兩斤，杯底喝盡，滿懷酒歡，滿面酒紅，

連珠的笑響中，浮沉著神仙似的酒翁！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沉浸在快樂之中。

志摩於民國十一年回國，就住在那裡，他第一部的白話詩集《志摩的詩》，仿宋宣紙，由中華書局代印，是志摩在松館將零篇交給我編的，次序是按著時間的。志摩的作品，以在北平這幾年為最多，我與他住松館，所以書的本事大體知道。書首有〈康橋再會罷〉一詩，這是志摩留別劍橋的詩，是白話詩的處女作，文言氣息很重，他很不滿意，要想刪去，我硬為編入，想不到今天在書店東出一本《徐志摩詩文選》，西出一本《徐志摩詩選》，雖然雜亂無次，而這首詩總是冠諸卷首，豈是志摩始料未及。〈蓋上幾張油紙〉一詩是記我的鄰居范家娘在雨天去買幾張油紙蓋在野外她死去孩子的小棺上，是我問了她而又告訴志摩的。〈深夜大沽口外〉及〈白鬚的海老兒〉兩詩，是民國十五年初春，國民三軍孫岳的軍隊守在大沽口以拒奉軍，我與志摩同乘通州輪北上，在大沽口停了一星期，無法進口。志摩正魂思夢想，與小曼相見，徘徊甲板，做了這兩首詩。其時我正在清華教書，所以跟他開玩笑說：「即時船退回上海，我倒好在江南教書了。」志摩罵我無同情心，我笑他情急。到了第八天，米及小菜都吃光了，太古公司才派來小輪，引導通州輪進口。這近四十年前的情景，好像還在目前。志摩能作駢文。又好讀李杜古風，所以他的詩長於韻律、氣勢及詞藻，當年有許多新文學家批評志摩的詩是大出喪，有排場而無內容，然而志摩的詩到今天還為人們所喜愛，真如杜甫詩：「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湖萬古流。」志摩在民國十三年送泰戈爾到日本以前，

林孟宗先生在來今雨軒錢別宴上說：「朋友大家要當心志摩，他近來精神不對，做了一首〈去罷〉寫給我，留作紀念。」他為鄭重其事，寫了好幾張。後來志摩自日歸來，他對我笑說：「死真是不容易啊。」想不到他於民國二十年來在濟南附近山峯撞機猝死，恐怕其情景真似〈去罷〉裡所說：

去罷，種種，去罷！當前有插天的高峯！

去罷，一切，去罷！當前有無窮的無窮！

志摩畢竟是李謫仙一流人物，他的飛空而死，與太白的捉月而亡，有何分別？

志摩在〈石虎胡同七號〉詩裡說：「大量的蹇翁，巨樽在手，蹇足直指天空。」蹇翁是貴州遵義蹇季常先生，他在松館是總務主幹，館長是新會，實際上都是他管。他是新會的智囊，也可以說是靈魂，新會對他是言聽計從，最有影響力的。他於清末留日歸國，任何南財政副監理官。南北議和，他是北方的議和代表。入民國後，他進袁世凱幕府，後任肅政使，並不任事，長居天津，終朝醉酒，因為他發現了袁氏有帝制的企圖，有違相與的初願。他與新會及先叔、松坡將軍都有極深的友誼，所以雲南起義，雖出梁蔡，而運籌帷幄，實為蹇季常先生，所以新會在護國軍紀事裡說，朋友中有一出力最多而不願出名的，就是指的季常先生。他告訴我，松坡將軍是由新會侍者曹五代購車票，化裝出京，到天津下車，即至意租界梁宅，其時新會及季常先生、黃遠庸、湯覺頓正在打牌，蔡公神態閒雅，若無其事，於是即共起集談，決定了梁蔡的行動。追究雲南起義最初的決定，由西南發動反對袁世凱帝制運動，實起於梁蔡決議，招貴州巡按使載戩入京面商，戴氏是季常先生的知

交，促成了這個運動，所以北海快雪堂松坡圖書館的蔡公祀陳列有蔡戴二公及陳敬民一張照片，這是蔡載定盟的紀念，蔡穿陸軍上將大禮服，戴陳都穿甲種大禮服，不成功即成仁，非常莊嚴。

蹇季常先生一生好酒，所以新會祝他五十壽集聯說：「四十九歲窮不死，三百六日醉如泥。」真是記實。他每天下午在五時後就開始喝酒，凡有客到，總是一支香菸一杯酒，並無小菜。如無客人及家人相陪，則邀館內住的人去聊天，我自在其列，所談大都是清末至民國的掌故，胡適之先生勸他寫自傳，將這些資料寫進去，就成了一部很好的民國史，這就可以知道季常先生在北京政府時代與政府關係的深切。十九年七月我赴德國留學，臨行，他對我說：「慰堂，你回來時看不見我了。」我說：「短短兩年，豈有看不到的道理。」他說：「你看罷。」那知我到德僅一月餘，他就服安眠藥自殺了。因為新會故後，他就悲觀消極，曾經一次自殺不遂，這次竟死了。松坡圖書館第二館就此結束，與北海第一館合併，房子賣給了蒙藏學校，我並不迷信，但確實符合了相傳的傳說。丁在君先生繼任新會任館長，他到中央研究院後，松館就此默默無聞了。

民國十二年我進松館，即由先叔及季常先生介見新會。十三年我在北大畢業，本來我想應南開中學的聘去教書，因為松館不要我離開，所以由志摩介紹給當時清華學校教務長張仲述先生，信是由新會寫給曹雲祥先生的。我進清華以後，與新會接觸才多，因為他在清華教書，尤其在他令姪助教の廷燦兄離開北平的時候，叫我代理職務，如抄講義之類，因為他的稿子都寫在紅格宣紙上，要遺留千古的，不能拿出去排印，要我們重抄，好在他的字最好認，我抄了很多，只錯了一個字。我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五回城，十五年他任國立北平圖書館前身北京圖書館館長，我也進了京館，擔

任中文編目。新會於每星期六由清華進城，在師大教書，中午則由松館同仁輪流作東，共一桌，如季常先生及李藻孫、陳博生、林宰平、楊鼎甫、梁仲策、徐志摩諸人，我也參加。下午則住在南長街其弟仲策先生家，打牌到深夜。教育改進社委託北京圖書館編輯四書、論語、孟子集目，由我擔任編製，拿去請教新會，他看了很高興，深夜兩時他約往談天，想照此辦法，編製各類書目，作一圖書大辭典。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則圖書大辭典編製計畫已經擬就，在我走後即寫，寫到天亮。新會對於青年稍有寸長，他立即採納，在學問上毫無成見，這是了不起而別人不可及的地方；至於他下筆之快，那就不用說了。

民國十七年初新會又入協和醫院檢查和輸血，先叔時方奉政府命赴日一行，特乘車經東北來北平探病，一到即吃晚飯，由我陪至協和醫院，除談病情外，新會忽然說：「百里，我們這班人，不是太閒嗎？」先叔回說：「青天白日旗總要掛滿中國的，這是必然的趨勢。」當時的北平還是奉軍的天下，所以第二天早晨他就離開北平，而奉軍國務總理潘復邀吃午飯的請帖送到之時，已經變名走了。是年九月新會因病決定辭去中國圖書大辭典工作，袁守和先生時已升任副館長，派我到天津勸慰，照舊工作。季常先生以為新會的病已經無藥可醫，不過拖延時間，所以叫我看看，如果病重，則接來北平進協和醫院，因為墓地及朋友都在北平，如果在天津，真是不便。我到天津，先見廷燦，他出示新會最後著作《辛稼軒年譜》，絕筆是引朱子贊語：「孰謂公死，奕奕如生。」後來回想，好像是贊新會的識語。我將守和先生的信交給新會的姨太太，並且說：「可見則見，不要勉強。」新會聽說我到，即約相見。他告訴我痔瘡發，牙痛，有微燒，「么麼小醜，鬧的我渾身不舒

服。」我看他面如古銅色，病象不輕。回到北平，報告了季長先生，他決定接新會至平，當時思成還在東北大學任教，所以一面催思成歸來，一面由仲策先生接新會至平。十一月二十七日進協和醫院，十六年一月十九日病故，在臨故一週前忽然精神見好，他還對我說：「再有兩年，就六十歲了，我想出一紀念冊，請朋友替我寫文章，講我在各方面的成就。」如請張君勸先生寫他的哲學思想，林宰平先生寫他佛學的研究，羅復堪先生寫他的詩，梁平甫先生寫他的書法。新會不肯休息，一有空閒，就寫文章。晚年絕意政治，如果天假以年，他還有貢獻，尤其是他寫的中國通史及中國文化史，沒有完成，這是中國學術界的損失。志摩於新會進協和之初，也到北平探病。他對我說：「我雖然他學生，但是他早年的文章沒有讀過，這次上車以前，買了一部《飲冰室文集》，略讀一遍，雖然時代已經過去，但在今日讀去，還有有味的。」胡適之先生趕到送殮，第二天早晨我到東城見到，剛巧有新聞記者在座，他說：「我老實說，我的哲學史是受著他的〈先秦哲學思想大勢鳥瞰〉一篇影響的。我們今天讀新會的文章，還是有味，好像親接警欵一樣。」

在松館匆匆住了八年，有良師益友之樂，我學問雖無所成，但是粗淺所知，是植基於這個時期的。

民國十九年七月我經浙江教育廳派赴德國考察及研究歐洲圖書館事業，離開石虎胡同那一天下一點微雨，很有惆觸，口占一絕：「昨宵夢醒舊春明，客裡整裝萬里行，是喜是悲渾未識，風風雨雨作離聲。」這是我八年石虎舊夢的回憶。